

中国年度最佳文学作品精选

名将记趣

报告文学

中国年度最佳作品精选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名 将 记 趣

董保存

名将记趣

董保存*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或工作关系或因本人兴趣使然，采访并熟识了一批几乎与党同龄的将帅。他们确是一代精英，其经历，其故事，其语言，其个性常令笔者拍案。于是随手记下一些笔记。日前一位在部队任职的朋友偶然读到，说：“有趣，也有用。”在其鼓动下，整理出几篇。

关于肖克

笔记之一 1987 年的墨宝

为修改小说《浴血罗霄》，随将军到当年他追随朱毛“闹红”的地方。将军在当地名声颇大。无论到哪里，都有围观者。儿童奔跑追逐，喊“肖克！肖克！”官员斥责并撵之。将军说：“不碍，名字就是叫的嘛！”

* 董保存，1954 年生，河北浑县人，著有小说，报告文学多部、篇。本文原载《解放军文艺》2001 年第 7 期及《北京文学》2001 年第 7 期。

当地领导请他参观纪念馆。他对这里的每一展品，每一图表都看得甚细。

解说员的声音：“这是当时阻击敌人时朱老总用过的机关枪。”将军低头观枪，遂问：“朱老总用过？”当地的负责人答：“听说是的。”将军摇头，“不要说朱老总，就是当时的团长也不可能抱起机枪和敌人打呀。”

一座山的模型，录音响起，逼真的枪炮声大作。灯光闪烁。解说员的声音：“……战斗中林彪贪生怕死，该增援的时候，他迟滞行动……”将军驻足，说：“这样讲不对，当时我在，林彪并没有迟滞行动，林彪不是胆小鬼，也不打滑头仗。他后来变了是另一回事。”

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他如此说，不少人面面相觑。

最后，他站在一个图表下，看了五六分钟。说：“你们把我当红六军团军团长的时间提前了一年，给不给补发工资哟？”跟随者没有人敢笑。

看完展览，他被请进休息室，官员说：“请首长留下墨宝。”

他沉思良久，说：“墨宝没有，送你们四个大字吧！”随即挥毫写下了——“求实存真”。

笔记之二 秀才制“谣（妖）风”

1988年，笔者随杨得志、肖克参加湘南起义60周年的纪念活动，顺路到了肖克将军的老家——湖南嘉禾。在那里，才知道他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祖父是清朝的贡生，教了一辈子书，父亲和伯父也都是贡生，他也读到了甲等师范。早年的教育，为他成为一名儒将奠定了基础。

他喜诗书，谈起诗书总是兴致勃勃。并戏言，“诗书不仅可陶冶性情，还可换钱谋生”——他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就靠卖对联糊口。

近八旬的他，背诵起小时伯父写下的四言诗，依然朗朗上口：

民国反正，不能善后。竟言共和，程度不够。四次革命，枪炮角斗。我诈尔虞，甲肥乙瘦……

到了湘南，又说到他当年的一首诗——

农奴聚义起烽烟，晃晃梭镖刺远天。莫谓湘南
陋五岭，骑田岭上瞩中原。

将军说，这完全是当时即兴而作，今天看来，后两句用了两个岭字当然不是佳句。他又说，那一首《谒王尔琢墓》还是表达了我的真实情感。于是吟诵起来：

智勇双全震赣湘，为除叛逆以身戕。时逾半纪
临君墓，如见英姿焕大荒。

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年轻人可能还是没有概念，这么说吧，林彪就是王尔琢手下的一个营长。如果不是王尔琢牺牲，林彪也许就当不成团长。如王尔琢不牺牲，说不定他的军衔要比林彪还高。林彪也许就当不成副统帅了。当然这都

是也许……

肖克和王尔琢的关系甚笃。肖克也很崇敬这位黄埔一期的上级。在他的领导下，肖克当过连长，当过副营长。那时的三个营长，一营长是林彪，二营长是袁崇全，三营长是肖前。

当时的情况很是险恶，不要说能看到革命成功，就是能看到革命的队伍扩大点，也是很不容易的。那位二营长袁崇全就对革命的前途完全失望了。他也不愿在山里转来转去，想去打大城市，想自立门户。

他拉起队伍就走了，没有和团里打招呼。

团长王尔琢以为他就是一时想不开，不是叛变革命，很是自信地说：“我去把他叫回来。”

王尔琢牺牲得很是惨烈、悲壮。他到了那个叫思顺墟的村子，袁崇全正在和一伙人打麻将。

王尔琢很是自信地叫：“老袁！我是王尔琢，我接你们来了！”

已经铁了心的袁崇全，哪里还听这个，以为王尔琢带了人马来打，于是就开了枪，于是王尔琢当场牺牲。

那时王尔琢不仅是主力团长，还是朱毛红四军的参谋长，他的牺牲，对红军来说，是不可估量的损失。但由于当时的条件，只能在他牺牲的地方就地掩埋。

肖克将军深感遗憾的是，追悼活动他没能参加，当时他也身负重伤。所以总想抽时间去看看王尔琢同志。在职在位时，没能去成。退居二线后，才了却这桩心愿。

站在王尔琢很不起眼的墓前，肖克将军的感慨颇多。他

和随行的同志说起了往事，说着说着，忍不住老泪纵横……于是也就有了他吟诵的那首诗。

这样一位常怀诗情的将领，自然是很少发脾气，不喜欢骂人、训人的。因而人们公认他是一员儒将。

然而，和他一起参加井冈山斗争的一位老者却说，不要以为他是知识分子，当年可是厉害得很！并向笔者讲起一件制止“发谣风”的故事。所谓“发谣风”，也做“发妖风”，是一个特定用语。刚开始“工农武装割据”时，农民起义的队伍很不稳固。特别是当他们背井离乡打仗时，会发生类似“炸营”的事情，有时是在行军路上，有时是在宿营的晚上，常常是一声吼叫，人就像发疯一样跑散了。

井冈山“八月失败”的时候，红二十九团打郴州就发起了妖风。呼啦啦乱跑。时为副连长的肖克，见队伍吼叫着要跑散，就大喝一声：“坐下，谁也不许动！”声若霹雳，吓人一跳。他手执一棍，大有谁敢乱跑就吃我一棍的架势。他以威严，硬是使红二十九团保留下来了一个连队。否则这个团就彻底跑光了。

笔记之三 大树将军

由于熟识了，说话也就随便起来。知道他是一个资格很老的上将，曾经是红二方面军的副总指挥，八路军一二〇师的副师长，晋察冀的副司令，华北军区副司令，也是一路“诸侯”。同时也知道他多年从事军队教育事业。

笔者问，如果从“山头”讲，你是一个方面军的副总指挥；如果从资历讲，你1926年入党，参加了北伐和南昌起义。

1955 年给你授了上将军衔，而比你资历浅的人却授了大将衔，你当时心里平衡吗？

将军反问，你知道“大树将军”的故事吗？

笔者不知，于是他说，去拿《辞海》，查“冯异”这个词条。

此典故是，东汉的时候，有一个将军叫冯异，他在河北参与消灭王郎割据的势力。大功告成以后，众将论功行赏，他却退避树下，军中因号为“大树将军”。

刘秀即位后，他被封为阳夏侯，任征西大将军，后死于军中。

说完这个典故，他就不再说话。那言外之意分明是，古人尚且能如此，何况我们呢？

笔记之四 检讨

接触多了，知道将军一生坎坷，但绝不悲观。特别是 1958 年，他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几十年后才得以平反。

有一天，我问了一个不该问的问题：“当年批判你的时候，你检讨过没有？”

将军坦诚地说，检讨过，但始终没有承认“反党”。

他目视远方，陷入了沉思，说：那时，大会批，小会斗，有时连晚上也不能休息。逼迫我检讨。从 5 月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批斗到 8 月，身心疲惫，心中窝火，加上精神紧张，在一次批斗会结束从礼堂回办公室时，忽觉胸口难受，就蹲在路边，大口大口地吐起血来。回到家里又吐了不少……

这时，我心里很痛苦。入党 30 多年了，我还想为党做更

多的工作，还想继续干革命事业，如果就这样死了，不冤枉？我想，只要人在，“戴帽子”又有什么关系？我已经是被打倒的人了，全部承认也不过是打倒。我在大革命时期入党，参加过两次北伐、南昌起义、湘南起义、井冈山斗争、长征等，人可以打倒，历史是打不倒的。

我决定作违心的检讨。一个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人，违心地承认强加给自己的污蔑不实之词，那种痛苦是不堪设想的。当时只好这样做。“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一定要以我毕生的言行来证明我对党的忠诚。

我按照他们的需要写了检讨，才算过了关。

那年秋天，开会讨论关于我的错误的决定，我心里是不服的，发言时就说“基本上同意”，这下又遭到批驳。他们说：“你说的基本是指多少？百分之五十，还是百分之六十？”一个同志很严厉地说：“你不服，再开个会研究一下？”我也敏感了，所谓开会是什么意思，不外是加强火力再斗一场而已。我不说话了。当时参加会的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等几位老师没有表态，才作罢，那个决定就算通过了。

关于聂凤智

因参与撰写《谭震林传》，笔者去金陵采访聂凤智，此时这位威震四方的大区司令员的喉管已经切开，脖子上戴着一条输氧管子。夫人何鸣说，他是1986年查出肺癌的，1989年再次动了手术，气管切开……

那天，他正戴着管子练毛笔字，宣纸上写下好几个“赤

胆”、“赤胆”。大概是认为这两个字写得不够满意，所以就反复练。

笔记之五 胆大包天

小时看电影《战上海》，不知道这其中的很多情节是聂凤智一手导演的——

在我军凌厉的攻势下，汤恩伯乘船逃跑了，留下个刘昌义被临时加了个“淞沪警备副司令”的头衔，“统率”剩下的五十一军、青年军和交警总队等。青年军、交警总队是“国军”中的嫡系，属“少壮派”。聂凤智深知蒋军内嫡庶矛盾的根深蒂固，刘昌义指挥不了青年军，本人又曾有过想向我方靠拢的表示，所以，一开始就集中力量打击蒋介石的嫡系“少壮派”，而对刘昌义进行争取。

不久，负责和上海地下党联系的同志回来报告说，通过内部关系，终于和刘昌义联系上了，并说，由于我军狠狠地打击了“少壮派”，刘昌义已感到危在旦夕，表示愿意考虑我方提出的条件，他已让刘昌义直接找聂凤智联系。

果然，不一会儿，电话来了，是从敌人警备司令部转过来的。他直截了当地对刘昌义说：“刘军长，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光明大道，就是放下武器。历史也可能会因为保全了上海，保护了上海 600 万人民而记你一功。可以保证你部全体官兵和你太太、子女的安全，这是陈毅将军要我转告你的！另一条道嘛，我不说你也清楚。”

刘昌义连忙问：“啊，请问阁下是……”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七军军长，聂凤智。”

“哦，哦，久闻大名！”

“刘军长，你决定吧。”聂凤智紧逼对方。

“请问，陈毅将军现在什么地方？”

“陈将军就在我们后面不远，他给你的投降命令已经送来，马上就到！”

这一招极其有力有效。刘昌义沉思片刻后就说：“我马上亲自来面谈。”

副参谋长知道，聂凤智哪来的“投降命令”。见他放下电话，就说：“军长，这命令……”

聂凤智手一指：“你马上起草一份。”

“我？”

“你代陈毅同志起草一份嘛！”

副参谋长哪里敢假造陈毅的命令，说：“这，这……”

“这是我的命令！”

聂凤智又对政治部主任说：“你找人去刻一个‘陈毅’的‘关防’。”

政治部主任直搓手，说：“这阵地上，到哪里去刻图章啊？”

聂凤智“狡猾”地一笑，说：“地里不有的是萝卜嘛！”

一切准备就绪，刘昌义到了设在虹桥一个小照相馆的二十七军指挥所。作战科长热情接待，就在楼上的聂凤智，却端足了“架子”，千呼万唤不露面。对作战科长说：“再晒他一会儿。”

作战科长“一请”，“稍候”，“再请”，“稍等”，刘昌义马上就感觉出了这个军人的地位和作用之重要。待终于“请”下楼时，又见他尽管貌不惊人，却是一脸威严，立时便有几分

敬畏。边上的人见聂凤智做得煞有介事，都忍不住窃笑。

“叫你刘昌义？”聂凤智劈头就问。

“是的。”刘昌义毕恭毕敬地立正回答。

“那好，我现在向你宣读我们陈毅将军的命令。”他就郑重其事地向刘昌义宣读起了那份盖有萝卜大印的“命令”。读后交给了刘昌义。

刘昌义匆匆浏览了一眼，点头表示“谨领”。

这时，聂凤智才客气地让茶让座，和他谈起了当前上海的处境，以及我党我军的一贯政策。刘昌义当即表示：五十一军他完全可以负责，并同意当晚就撤出阵地，分别在江湾、大场集中，听候处理。可其他老蒋嫡系，他无能为力。聂凤智说，只要五十一军解决就行，其他的不为难他，并客客气气地把他送出门口。

五十一军的顺利解决，极大地动摇了上海市区整个防线上敌人的防御心理。七十九师抓紧时机，分头抢渡、迂回包抄，使正在因五十一军的撤出而忙于调整部署的苏州河北岸之敌很快顾此失彼。

也正是在此时，后来成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的七十九师二三五团七连指导员迟浩田，率两名战士从下水道钻过，首先抢渡成功，直闯敌人指挥部，俘获了一名上校师长，并迫使整个师部和三个营的官兵缴械投降，创下了攻克上海闹市区时的一个奇迹。

二十七军率先突破苏州河防线，像一把锋利的尖刀，勇猛而迅速地插进了上海的核心部位。

这时，陈毅打来电话：

“聂凤智吗？前面情形怎么样？”

聂凤智不免有几分得意地说：“刘昌义投降了，现在苏州河也突过去了。”

“好哇，你用的什么法术？”

聂凤智报告了“造假”的经历。陈毅听了哈哈大笑。

“好你个聂凤智，胆大包天，居然把我也‘全权’代表了。”

笔记之六 敢走险棋

笔者去采访聂凤智，临行前，一位老将军说起他：“那家伙可是敢出险招！敢出奇招！”紧接着又慨叹一声：“无险就无大胜！人生就如此啊！”

他向我说起百万雄师过大江时的一着险棋——

当时，国共两党军队对峙于扬子江边。聂凤智所率二十七军的进攻正面有一个江心洲，名曰黑沙洲，洲不大，却是水上咽喉要地，敌人派重兵把守，工事十分坚固复杂，是江防中的第一道防线。要想过江，必须先拿下它。

聂凤智先后十多次派侦察兵过江，上演“渡江侦察记”，摸清了敌人在黑沙洲和长江南岸的江防情况，还抓回几十名“舌头”。

军党委会研究渡江方案时，有人主张，先集中兵力，打下黑沙洲，有人建议分三个地方突击过江。聂凤智闷头不发言，待大家讲得差不多了，他说，我不这么看，黑沙洲不宜强攻，强攻正中敌人下怀，用一个师“看”住黑沙洲，两个师从黑沙洲两侧偷偷绕过。设想一出，大家议论纷纷。

有人小声说：“异想天开！”

有人干脆说：“军长，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聂凤智说：“军事上的‘绝对’是没有的。正是由于谁都看到不取黑沙洲就无法过江，谁都知道一览无余的江面大部队无法偷渡，谁都觉得百万大军的行动无法保密，才为‘偷渡’提供了可能。敌人面对的是我陈兵江畔的强大压力，枪一响，必定全力以赴对付正面攻击，也一定会忽视非正面的突袭。”

他又说：“攻取黑沙洲，是毫无问题的；但必然耗费时间，必然要造成伤亡。我想了又想，觉得还是用一个师看住它。另外的部队隐蔽或相对隐蔽地接近南岸，攻击效果会大不一样……”

然而，任凭聂凤智说破嘴皮，意见还是无法统一。聂凤智的脸一黑，一字一顿地说：

“军事问题，军事主官有权决定。我决定，八十一师一个团‘看’住黑沙洲。对黑沙洲实行半圆形三面佯攻，另两个团摆在后面不动。七十九师、八十师绕过黑沙洲，直取南岸。错了谁负责，谁不执行，谁对党负责，撤职枪毙，不要怪我。”

他用自己的权威“统一”了意见。

总攻发起后，正如聂凤智所料，黑沙洲守敌果然全部被八十一师一个团的佯攻火力所吸引，竟对两侧飞帆而过的大部队毫无反应；南岸的敌人也因此在我大部队快抵岸边时才发现，手忙脚乱地放枪打炮。二十七军第一个突破了长江天险，横渡过了长江。

聂凤智随第二梯队赶到指定的会合地点，正碰到了二三七团的政委丁锐。丁锐高兴地喊：“啊呀，军长，你先到了？！”

聂凤智问：“你的部队呢？”

“很好哇！”

“我问你伤亡情况！”

“奇了，一个也没有。”

“一个也没有伤？”

“一个重伤都没有，擦破块皮就不算了。”

“你他妈的，研究的时候你还哇啦哇啦跟在他们屁股后面叫不同意。”

“啊呀军长，你报复也不要这么快吗？那个时候，我们哪儿想到这么好的结果啊！”

大部队过江后，黑沙洲很快被八十一师拿下。二梯队的一只运输船，渡江中还缴获敌人的一艘铁甲炮舰！聂凤智待各部会齐后，口授了一道仅仅 12 个字的电报，命令电台用最快的速度拍发给毛主席和党中央：

我们已胜利踏上江南的土地。

此时的将军，那才叫潇洒，那才叫富有诗情。

笔记之七 攻城不准打炮

聂凤智是笔者所见过的，个性鲜明的战将之一，他的故事，提起来一串，放下去一堆。老作家松植写过他的传记，谈起来更是滔滔不绝——

扫清上海外围以后，二十七军占领上海西郊的虹桥机场，随之攻入了市区，攻到苏州河边。北岸敌人居高临下实施火

力压制，部队伤亡增加。聂凤智接到电话，请示动用炮火攻击。

此前，中央要求“军政全胜”，尽可能地保全上海、尽可能地保护好人民的生命财产。聂凤智根据自己的理解，命令部队——不打一炮，不用一个炸药包。也许是扫清外围的战斗不是很激烈，部队没有叫唤。一到市区矛盾尖锐起来了。

聂凤智赶到苏州河边。苏州河有30多米宽，北岸，敌人利用岸边的高楼大厦，部署了强大的交叉火力，桥头、路口筑有坚固的碉堡，坦克和装甲巡逻车不时开过，把河面、桥面、路封锁得滴水不漏。

南岸，却是一条空旷的大马路，部队进攻通道暴露在敌人密集的火力下。由于“禁止”用炮，无法有效地摧毁敌人的火力点，无法有效地压制对方，进攻的部队几乎成了敌人的活靶子。特别是外白渡桥边，敌人的轻重机枪从对面高耸的百老汇大厦上疯狂地扫射，正在攻击的部队一批接一批地无情倒下……

聂凤智来到前沿，部队早已被打得哇哇叫了；有的干部把山炮、野炮、榴弹炮、九二四步兵炮，一股脑儿地都搬到前面来，好几十门大炮的炮口齐刷刷地对着百老汇大厦。

“军长，下令开炮吧，保证一炮一个火力点，几炮就把对岸的敌人火力点全干掉！”

“军长，三包炸药一拉，保管把他娘的那幢大楼炸飞上天！”

“军长……”

看着大家的激动情绪，他反倒冷静下来了。

多少年后，聂凤智回忆说：“当时干部战士都打红了眼，只要我一句话，苏州河北岸顿时就是一片火海，对面就可能在我们的炮火中夷为平地，无数平民百姓就不可避免地会在炮火中丧生……上海没有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暴政下毁灭，却在人民解放军的炮火中遭受损坏，历史，又将怎样记下这一笔？”

考虑再三，聂凤智含着眼泪做出决定：“禁令”仍然不能解除，绝对禁止打炮！谁敢擅放一炮，军法从事！

在这种情况下，党委临时会议上发生了激烈争议。批评的矛头都指向他，意见极其尖锐刺耳：

“请问聂凤智同志，我们现在是不是打仗？”

“上级要求军政全胜，也没有说不准用炮！”

“下面干部战士的反映说，我们的军长到底是爱什么？是爱官僚资产阶级的楼房，还是爱我们干部战士的生命和鲜血！”

……

听着听着，聂凤智汗水湿透了衣服，他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压了压火，还是尽量用平和的口气说：“说我爱官僚资产阶级的楼房，不爱干部战士的生命鲜血？上海的楼房现在是资产阶级的，解放后，楼房就是无产阶级的了。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如果破坏了，就会影响日后整个新中国的建设，花多少钱才能建设一个新上海？这个钱，还不照样是人民群众的血汗？蒋介石就希望我们这样把上海打烂。如果开炮，不正中了他们的下怀！我们现在忍耐一些痛苦，再作一些牺牲，正是爱我们的战士，爱我们的部队，爱我们的

事业。我们只有把上海完完整整地从敌人手里夺回来交还给上海人民，那才是真正的爱！”

“这些道理谁不懂？批准打一两炮就有那么严重？”对方还带着“火药味”。

“牺牲苏州河北岸这个局部来保全上海这个整体，也不能说有什么不当。”

.....

会议开了一夜，还是争论不休。最后，他以军长的身份再次严令：

“我再说一次！已经有令在先，谁要打一炮，我就要这个人的脑袋；谁要用一包炸药，我就要这个人的脑袋！这是个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错了我个人负责！”

事后，聂凤智回忆说，我当时横下一条心，说我“独断专行”也好，说我“个人英雄主义”也罢，我当军长就得执行我的命令。

原来临时党委会的精神传下去后，部队仍然有抵触情绪，炮团的一位战士就是不买账，哇哇叫着：“他妈的，我就要放他一炮！”

副团长说：“别胡来，打了要枪毙！”

话音没落：“轰”的一声，炮弹飞出去了。

这一炮，把百老汇大厦打了个大窟窿；副团长吓呆了。在二十七军，“聂军长”的厉害尽人皆知。说“要脑袋”，就是真“要脑袋”，他一面准备逮捕那名战士，一面电话报告聂凤智。

聂凤智接到报告，不由哑然失笑，从内心说，他十分理

解甚至喜欢这样的战士，喜欢他“抗命”，喜欢他敢骂自己，敢与自己唱对台戏，这样的战士只要调教好了，绝对是个好兵！

聂凤智破天荒地“心软”了，他给副团长交代：

“行了，就不要逮捕了，战士嘛，敌人把他打火了，伤亡那么大，有股子气，干出一两件傻事也是难免的；教育教育就是了。倒是你们，作为干部，应该好好地认真掌握部队。你们没有掌握好部队，战士错了，又搞他，不就错上加错了，以后要绝对注意不能再出事！”

聂军长说了不算数，这在二十七军历史上也许是绝无仅有的。

关于杨成武

笔记之八 “好战分子”

作为战将，杨成武是幸运的。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许多重要关头，杨成武和他率领的部队都起到了非常特殊的作用。长征中的突破乌江、飞夺泸定桥、抢占天险腊子口，抗日战争中经营晋察冀一分区，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中击毙日军中将阿部规秀，解放战争中的清风店，抗美援朝中粉碎美军1951年夏秋季攻势的作战等等。

正因为他有战将的幸运，有人对笔者说，那事情是让他赶上了，要是我们赶上可能比他打得还好。为此，笔者当面问过杨成武将军。将军哈哈一笑，说：“这话有道理，我并不比别的将领高明。是历史把我放在了那个地方，如果换了别

人也许比我们打得更漂亮。”

然而，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其实细细考察起来，你就会发现，制造战争奇迹的机遇只垂青于那些具有战将素质的人。

一位年轻将军对笔者说：战将最基本的素质是两个字——“好战！”

乍一听，这话似偏颇，很有点“鹰派”的味道。细琢磨，也有其道理所在。

总政治部原副主任史进前将军对笔者说，要不是杨司令“好战”也就不会有黄土岭，就不会打死阿部规秀中将。

当时人们称杨成武是“好战分子”！

由于这个词不甚好听，笔者专就此事访问了他的夫人赵志珍。赵志珍也是一名老军人，说话理直气壮：军人不好战算什么军人？他就是个好战分子。对日本鬼子好战！你想想，他那时 25 岁，血气方刚……

笔记之九 聂帅如是说

本来，那次杨成武要到阜平县青山村去参加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工作会议，同时还要开晋察冀军区成立两周年纪念大会。应该说，这样的会开起来还是比较轻松的。

10 月 31 日晚上，杨成武接到分区司令部送来的敌情报告：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派过村大佐率一个大队和伪军 1000 多人驻进了涞源县城。他们打算分三路对一分区腹地进行“扫荡”。

自从参加完平型关大战，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以来，

身为一分区司令员的杨成武一直想打仗，眼下机会来了。

杨成武立刻跑去找聂荣臻。

“聂总，有情况……”

一向很谨慎的聂荣臻一面听，一面看地图，听他讲完，问：“情报准确吗？”

“没有问题！我们的情报一般都经过多方面证实。那个叫‘催命鬼’的崔明贵送来的情报。”

聂荣臻当然也知道这个情报人员。他问：

“你的意思是想打一仗？”

杨成武点点头，说：“我看是个好机会。”

“有多大的把握？”

“应该比较有把握。”

“要是打，你准备打哪一路？”

杨成武一边说，一边在桌子上摆东西：“我看打东路！从涞源到银坊全是深山大谷，出涞源城，过白石口，再往南到雁宿崖、银坊，中间只有一条山路可走，两面都是大山，不难找到伏击地域。”

“那可能是敌人的主力呀。”

“我们的主力也在这里。他虽然是主力，可也是孤军一支，另外两路也没有办法支援他们。”

聂荣臻点点头，说：“那好，你去把贺龙、关向应、彭真等同志请来，也听听他们的意见。”

杨成武一阵小跑到了彭真住处。正巧贺龙、关向应也在。他们很快被请到聂荣臻的住地。

杨成武把自己的想法陈述了一遍。

彭真说：“既然有把握，就可以打。”

贺龙风趣地说：“送到嘴边的肥肉哪有不吃的！”

关向应也同意打一仗。

聂荣臻说：“大家都认为应该打这一仗，杨成武你就不要参加会了，回去组织指挥战斗。”

在有些人看来，这一仗，可打，可不打。如果不是一个“好战”的司令员，是不会主动打这一仗的，如果不是主动打这一仗，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惊人故事。

笔记之十 黄土岭

聂司令做出决定的第二天一大早，杨成武骑上战马，带上两个警卫员就往回赶。他们没有直接回管头分区司令部，而是绕了一个大弯子，特意走银坊、雁宿崖、三口、白石口、插箭岭、黄土岭。他对这里的地形比较熟悉，但要打仗，就必须再次察看地形。

从白石口至雁宿崖，是个宽约40米的干河滩，两边的山岭陡峭，如果伏兵两侧，并以一部兵力诱敌至此，再火力封锁住白石口，断敌退路，敌人就插翅难逃，只能葬身于乱石之中。

笔者曾经到这条沟里进行考察。那里的地形是天然的伏击战场。两边是山，中间是河滩，是沟。

到银坊三团驻地，团长纪亭榭、政委袁升平、副团长邱蔚已是磨刀霍霍了。——他们何尝不是“好战分子”？杨成武对他们说：“你们准备打硬仗吧！”纪团长说：“我们就等着你这句话呢！”

“袁政委，你可要把他看住了，决不能再让他去打冲锋！”杨成武笑着说——他是指东西庄战斗时，纪亭榭抱着冲锋枪上第一线的事。

袁升平说：“杨司令，这回我搞两人把他死死看住！”

吃饭桌成了他们的沙盘，碗筷都是地形地物，边吃边研究作战方案。扔下饭碗，杨成武就叫电话兵接通了其他各团电话，下达了向战斗地域运动的命令。

回到管头，杨成武在分区司令部召开干部会议，对作战方案再次进行了研究。

“首先要把敌人引进我们的伏击点，还不能让他们三路敌人合在一起。你们说怎么打？”

团长政委们纷纷出主意。

最后，杨成武宣布：以一部分兵力和地方游击队去牵制、堵击插箭岭、灰堡之敌，不使那两路敌人接近我们战场；曾雍雅的第三支队和梁正中的县支队由白石口向雁宿崖佯动，充当“狼诱子”，把敌人引入雁宿崖地区；唐子安、黄文明率三分区第二团，纪亭榭、邱蔚、袁升平率第三团，分别埋伏于雁宿崖东西两面；陈正湘、王道邦率第一团插至白石口南，准备截击敌人的退路。

一切布置停当，杨成武要通了聂荣臻的电话：

“聂司令，我们都安排好了。三个主力团对付他的一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你看还有什么指示吗？”

“你们一定要抓住战机，争取把这一路敌人都消灭！我不离开电话，你随时向我报告。”

当夜，杨成武命令所有部队悄悄进入伏击阵地，杨成武

知道指战员们要受苦了，他们要在山中露宿过夜——要知道，已是秋末冬初时节。

11月3日，天不亮杨成武就上了山，透过淡淡的薄雾，他说：“这是个好天气！”

7点多钟，曾雍雅的第三支队、梁正中的县支队先同敌人接上了火。敌人以为他们好欺负，紧追不舍，很快就到了雁宿崖。

另外两路也与敌人先后接火。东路敌人600余名进至白石口后，游击队第三支队一部，节节抗击诱敌深入。日军为相互策应，保障其侧翼安全，兵分两股，一股200余人，取道辛庄、北道神前进，从侧后进入设伏地域。第三团一部当即进行猛袭，击退日军五次反扑，毙伤其大部。接着第二团亦投入战斗，将余部压迫至雁宿崖西北高地。

与此同时，另一股日军300余人被引入雁宿崖狭谷，当其前卫到达张家坟时，第一团一部迅速迂回至狭谷北口三岔口断其退路，第三团一部封锁狭谷南口，第一、第三团主力从狭谷东侧，第二团及第三团一部从狭谷西侧勇猛夹击，经数小时激战，日军被歼过半。此时雁宿崖西北高地上的日军残部被压缩进狭谷，一并被包围在雁宿崖村内及附近一个马鞍形小高地上。

小高地成了这次战斗的惨烈之处。各团的部队都运动到了小高地的下面。但敌人占据着有利地形和火力优势，又只有一面陡坡能上去。

三团在电话里报告，担任主攻的一营冲上山头后，和敌人展开了白刃战，最后又被压了下来。“司令，天快黑了

……”

如果让日军坚持到天黑，他们的援兵很可能赶到，杨成武皱了皱眉，说：“不行，天黑前必须解决战斗！”

日头还有一竿子高，杨成武向部队发出命令——总攻开始！

打起仗来，有时候就是一股气！冲锋号声震天，喊杀声四起，队伍如潮水一般冲上了高地。

17时30分，战斗结束。毙伤日军600多人，活捉了13个鬼子。另外两路日军被游击队第三支队一部和第七一五团一部阻击一天后，向插箭岭据点和涞源城撤退。

这一仗打得干脆利索。杨成武对部队很满意。但据他自己的经验，日本人是不会甘认失败的。他们很可能要想法报复。失败越惨，报复得越是厉害。

笔记之十一 好战本色

不出杨成武所料，11月4日凌晨，又来了新情报：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第二、第四大队约1500人（伪军除外），沿着第一大队的旧路，企图寻找我主力决战。

敌人肯定是来者不善，是见好就收，还是再打一仗？再打就有两种可能——打胜了当然是锦上添花，打败了，前功尽弃。有个资格很老的同志对杨成武说：“行了，见好就收吧。”

杨成武不说话，认真思考着。打与不打又摆在了他面前。那个同志又说：劝你也没有用，好战分子！

果然，当天，杨成武就把这新情况用电话报告给了聂荣臻。

“聂司令，我们还可以再打一仗。”

电话那头没有立即表态。

他又说：“刚打了胜仗，伤亡很小，士气很高，主力部队正在银坊、司格庄一带休整，出击方便。银坊以东，直到黄土岭，地形利于设伏，只要敌人敢由银坊东进，我们一定能伏击成功。”

“别急，让我再考虑一下。”

杨成武很清楚，聂司令是很谨慎的。

过了一会儿聂荣臻又给杨成武打来了电话：“同意你们的意见，我和彭真、贺龙、关向应商量的，他们也同意打。贺龙怕你们兵力不足，决定让第一二〇师特务团作为预备队，天黑前赶到黄土岭地区，归你指挥。此外我们让第二十、第二十六、第三十四团牵制易县、满城、徐水和平汉线上的敌人。”

“太好了，那我们胜利就更有把握！”

“争取再打一个歼灭战！”

当夜，日军到达雁宿崖。侦察员向杨成武报告说：日军把我们已经埋了的尸体又都挖了出来，浇上汽油焚烧。河谷里全是一股焦糊的味道。

杨成武判断，敌人不可能是为了这些尸体，他对作战参谋说：“要一团、三支队，保持和敌人接触，把敌人引到预定的区域。”

11月5日清晨，日军进至张家坟一带，游击第三支队、梁支队、第一团各一部先后与日军交火，他们打打停停，停停打打，诱其深入。而第七一七团、第二十五团、游击第三支队各一部，则潜出至涞源城东俘图峪，城西灰堡、石佛，声

东击西，袭扰迷惑日军。

当晚，日军大队进至司格庄、银坊一带，这里的老百姓早已跑空了，日军点燃了房子，把整个村子烧了个精光。杨成武看着熊熊的火光，心中更有了底，敌人是要想法报仇的。

第二天早晨，日军在游击队的诱击下，于黄昏进抵黄土岭，搭起帐篷，开始生火做饭……

在指挥所的杨成武决心已下，就在黄土岭以东上庄子至寨头之间狭谷伏击日军。他打电话给一团陈正湘：“你们和二十五团立即赶到寨头，堵住敌人东进的道路。”

杨成武又派人通知三团连夜进至黄土岭、上庄子南面的高地，并加强分区炮兵营占领寨头东西、西南高地。三分区的二团绕到敌人后面，形成对敌的包围。

如果说前一仗是把三路日军中的一路装进口袋里打的话，这一仗就是要把全部的敌人包饺子。不过“饺子馅”可不是那么软——日军集中兵力形成了拳头。

当夜，日军发现黄土岭西北有八路军主力活动，判断八路军是以一部分兵力诱其进入黄土岭，而主力向该地集结进行围歼，预感到被歼灭的危险。

7日清晨，天空飘起了细雨，敌指挥官显然已改变决心，放弃寻歼八路军主力的企图，决定立即经上庄子、寨头，避开八路军主力，绕道返回涞源城。随即率部冒雨向上庄子、寨头方向边侦察，边交替掩护前进，虽然十分谨慎，行进速度非常缓慢，却始终未发现两侧高地上的数千伏兵。

笔记之十二 阿部之死

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击毙的日本军官中，军阶最高的当是阿部规秀中将。

这件事一直是中国军人所乐道的。后来围绕此事也有了许多不同的说法——有人说，那是瞎猫碰上了死老鼠，也有人说，阿部是参加这次战斗的另一支部队打死的……

笔者反复考证，当时情景是——

当阿部规秀率部进入设伏地域时，我预伏部队突然发起战斗，第一、第二十五团一部迎头阻击，第二、第三团分别从西、北、南三面包围，展开猛烈攻击。这时一二〇师特务团从第三团左侧加入战斗。日军猝不及防，急忙抢占上庄子东北高地，并向寨头反扑，双方展开激烈的争夺战。

16 时许，第一团团长江正湘举起望远镜，看到黄土岭与上庄子之间那个叫教场的小村子里一座独立院落内，有多名日军活动，还有人举着望远镜往山上看。这引起了陈正湘的注意——这会不会是敌人的指挥所？他拎着望远镜找到了分区炮兵连。

“杨连长，你看——”

他把望远镜递给炮兵连长杨九秤。

杨九秤看明白后，说：“团长，我们就朝那边打！”

战争中的很多奇迹是在一瞬间发生的。随着几声炮响，教场村边的小院子里腾起一股烟尘。望远镜里再也看不见人影。

经数小时激战，日军被歼过半，余部被压至上庄子附近狭谷底部。是夜，日军残部连续突围 10 余次，均被击退。

在黄土岭激战的同时，驻涞源、灵丘、易县、满城、唐

县、完县的日军第一一〇、第二十六师团及独立混成第二旅团余部分路增援，迅速向黄土岭方向逼近。

8日晨，日军飞机空投7个降落伞，除弹药、粮食外，还有指挥官。日军很快组成临时指挥所，指挥被围日军在5架飞机掩护下，向上庄子西北方向突围。第一团和第二十五团一部把突围的日军拦腰截断，并包围了被阻截在上庄子的200余名日军。约400名日军突围至上庄子西北高地，继续向司格庄方向逃跑。第二团从右翼、第三团从左翼加入战斗。在给突围和被围日军再次重创后，为避免陷入被动局面，根据晋察冀军区命令，参加部队立即撤出战斗。

几天后，聂荣臻司令员打电话告诉杨成武：“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延安拍来贺电，说你们击毙了阿部规秀中将，并向我们祝贺。”

杨成武又惊又喜，他根本没有想到日军的中将旅团长会亲自来黄土岭。他抓起电话就给陈正湘打电话：

“老陈，告诉你，咱们打死了一个大官！”

“大官？有多大？”

“团长？师长？”

“再往大里猜！”

“还能是什么官？”

“中将，一个日军中将！”

“我×！”陈正湘叫了起来。

“赶快打扫战场，找一找阿部中将的东西！”

参战各团很快知道了这个喜讯，他们立刻打扫战场，寻找阿部规秀中将的战利品和遗物。当天，就找到了镶着两颗

金星的黄呢子大衣，和嵌有银菊花的指挥刀。后来，他们把这些东西送到了军区，军区又派人送到延安。

日本陆军省发布阿部规秀阵亡公告后，《朝日新闻》撰文称“中将级指挥官在作战第一线阵亡，在日军军史上是少有无先例的”，“护国之花凋谢了”。

几天之后，杨成武又收到八路军总部转来的蒋介石发给朱德的电报：

朱总司令：据敌皓日（19日）播音，敌过村部队本月江日（3日）向冀西涞源进犯……支日（4日）阿部中将率部驰援，复陷我重围，阿部中将当场毙命等语，足见我官兵歼敌英勇，殊堪奖慰。希饬将上项战斗经过及出力官兵详查具报，以凭奖赏，为要。中正

值得提一笔的是当时国民党说八路军游而不击。当年彭真要杨成武给抗日刊物《新长城》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瞧一瞧八路军是不是游而不击》。

关于黄克诚

笔记之十三 绰号趣闻

黄克诚的警卫员告诉笔者，大将有俩个不雅的绰号——“黄瞎子”和“黄老头子”。

“黄瞎子”——他的眼睛高度近视，没了眼镜便模糊一片，战时夜行军，前面的人喊：“有坑，跳！”他就跟着蹦。有一次，前面的小鬼捣鬼，没有坑也跳，他在后面也跟着一蹦一跳，逗得人们捧腹。还有一次，他看到前面有个影子，以为是司令部的某参谋，就拍着那人说：“小伙子，好好走！”人们哈哈大笑，原来，那是一匹白马……

叫他“黄老头子”，是因为他有气管炎，咳起来浑身直抖，再加上不注意衣着打扮，有时候和农村的老人别无二致……在新四军时，他到十旅的司令部去，到了门口，站岗的卫兵不让他进，“老头儿你找谁？”他说，我要找你们的刘震司令！卫兵以为他无理取闹。他火了，说：叫刘震出来！刘震真出来了，立正敬礼叫：“黄师长！”

粉碎“四人帮”后，他到总后去找洪学智，卫兵又把他拦住，问：“你这个老头子要找谁？”他说：“找你们部长。”人家说什么也不信，以为是上访的。他说，不信你们找洪学智来问问……

老警卫员说，别看黄老的身体不是很好，“他的骨头可硬！”

笔记之十四 何谓诚臣？

何谓诚臣？刀架在脖子还敢犯颜直谏者。

黄克诚有过之而无不及。黄老夫人唐棣华向笔者讲述了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和他的一次谈话。

在此之前，山上的气氛已相当紧张，中央常委刘少奇、周恩来等找他谈话，要他和彭德怀划清界限，但黄克诚仍“执

迷不悟”。

实在不行，毛泽东亲自出马和他谈话。

作为毛泽东提名的总参谋长，应该说他身上有毛泽东欣赏的东西，否则，怎么会叫他当总长呢？所以毛泽东找他谈话还是很有人情味的，他们一起共进了晚餐。

毛泽东谈话历来是天高地阔的，无所不谈，说目前的形势，也说历史上的情况。

当他们谈到当年四平保卫战的情况时，毛泽东突然问：“难道四平保卫战打错了？”

黄克诚说：“开始敌人向四平推进，我们打他一下子，以阻敌前进，这并不错，但后来在敌人集结重兵寻我主力决战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应该固守四平了。”

“守四平当时是我决定的。”

这时黄克诚说出了字字千钧的一句话：

“你决定的也是错误的！”

毛泽东说：“那就让历史和后人去评说吧！”

此后毛泽东又和他谈过许多，几乎每件事都有争辩。

笔记之十五 说真话九次被撤职

在黄克诚的革命生涯中，庐山这样的事情并非绝无仅有。在此之前，他有过八次被撤职的经历。第一次，是笔者到湘南时采访到的——

不到湘南，不听当事人的讲述，真不知道当年“左”到什么程度。为了防止敌人来清剿，湘南特委异想天开地以为烧光杀光，敌人来了没有房住没有饭吃，就可以不打自退，因

而提出的口号耸人听闻：

“烧烧烧！烧掉一个旧世界！”

“杀杀杀！杀尽一切土豪劣绅！”……

当时在永兴县委工作的黄克诚接到的指示是：

县衙门要烧！土豪的房子要烧！县城的街道和商店也要烧！从衡阳到坪石公路两侧 15 里要统统烧光！

现在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但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

接到指示后，黄克诚找到县委书记据理力争：“这么干老百姓是反对的，弄不好要出乱子。”

“出什么乱子？对敌人就是要狠！你黄克诚是什么立场？”

“什么立场？老百姓的立场！”

“对敌斗争不敢下手！右倾！”

“这不是对敌斗争，这是烧房子。我们这么干，老百姓不同意的！”

“你这是尾巴主义！！”

年轻气盛的黄克诚吼道：“你这是盲目蛮干，后果你来承担？”

县委书记说：“这是组织的决定，必须坚决执行命令！”

“这是错误的，我无法执行！”

“不执行我就要严肃处分你！”

当时，在黄克诚的心目中，党组织是无比神圣的，他可以反对一些人的决定，但决不可对抗组织。但在执行时还是大大地打了折扣，只烧了县衙门，大部分房屋和商店硬是保留了下来。

县委就开会批评他右倾，要他写出检讨。黄克诚说，我

没有错，我写什么检讨？

于是，他的县委委员被撤了。

实践证明，黄克诚的反调唱的是有道理的，当时坚决执行了湘南特委指示的郴县县委，引起了农民反水，把县委的干部几乎杀光了……

此后，他到三军团正赶上立三路线占上风，上上下下吵吵着打大城市。黄克诚认为这是头脑发热，拿我们的那点力量去打大城市，好比以卵击石。他给军团长彭德怀写信，陈述自己的看法。三军团打下平江之后，研究下一步行动，他又提出反对攻打大城市的意见，因而受到严厉批评，撤销了准备委任他为纵队政委的任命。

1932年，红一方面军决定打赣州，兵临城下，他和彭德怀吵了起来，说：“彭老总，你这是半个立三路线！”彭德怀也是执行上级指示，他说：“不管什么路线，要打就得打赢！”结果，打赣州失利，黄克诚在未接到命令的情况下，主动撤出战斗，从而保存了实力，幸未被追究。

但后来，他因为支持毛泽东的一系列主张，反对错误的指示，被批判了一个多月，他和军政委贺昌吵了一路，走路时吵，住下以后还接着争论。他对贺昌说：“我们要争论20年！”

黄克诚自己说过：“我和彭老总的关系，可以说是合作了一辈子，也吵了几十年，有时候是他对，有时候是我对。我当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时，在总参大楼里吵，不少机关干部都说，这两个人怎么这么吵哇？为了工作，言不及私，吵了也不会影响关系。”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以后，三军团在广昌开会，黄克诚支持毛泽东的路线，因而被撤了三师政委的职务。

红军长征途中，他又因为提意见反对打消耗战，被认为是右倾，调离他所在的三军团四师，当了司令部的侦察科长……

值得特别提一句的是，当年苏区打AB团，一开始，黄克诚也跟着杀过人，这使他一生痛悔不已，直到晚年，还为此痛心。到了大打AB团的时候，他就拒绝再乱杀人了。他还安排被怀疑是AB团的人藏起来，坚决顶住肃反委员会的杀人命令，结果不仅被撤职，险些自己也掉了脑袋。

笔记之十六 不搞“抢救”

几位新四军的老人，向笔者说起1943年的春天的“抢救”运动。

当时中央有指示，谁也不能不执行，但黄克诚有自己的办法。——在他所领导的三师七旅搞一个小小的试点，他亲自坐镇，实地考察。

“抢救”一展开，问题就出来了。被抓起来的人，特别是小知识分子，一经审问，就开始乱供一气，咬出了许多的人。

黄克诚坐不住了，说：“好了，这样下去，七旅很快就能‘抢救’出一半的人来。”

“那怎么办啊，怎么给中央交待？”

“决不能再这么搞了。马上停下来，有问题我负责。”他说这话的时候斩钉截铁。

回到三师，他下令，所有部队停止“抢救”，发现问题

的人，按照正常的手续处理。

一些好心人劝他说：“这样和上面对着干，怕会有麻烦吧！”

黄克诚说：“我一个人有点麻烦，没有关系，我也不怕麻烦。要是那么多的人都有麻烦，可就真麻烦了。”

不久，华中局召开整风汇报会，黄克诚又遇上新的情况。他和七师政委曾希圣住在一个房间。平时两人见了面，有说不完的话，这一次，曾希圣却好像有什么心事，不怎么讲话，这是怎么回事？

晚上熄了灯，黄克诚说：“希圣，你有点不对头啊，出什么事了？”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你骗不了我，有什么事尽管说，能帮忙的我一定会帮忙。”

曾希圣还是不说，看来情况复杂。

夜晚，曾希圣睡不着，黄克诚也没睡着。曾希圣披上衣服下了地，他也跟着下了地。

在有些春寒的夜晚，两个战友又谈了很久，曾希圣才说出了真实情况——原来曾希圣的爱人余叔被人揭发，说她可能是个特务，现在正受审查。

“余叔会是特务？”黄克诚不信。

曾希圣不说话，只抽闷烟。

“你信不信？”

“人证、供词都在，我不信又有什么办法？”

“是什么人供出来的？”

“二师政治部的。”

“她怎么知道？”

“她们在上海时是同学，在上海时就……”

黄克诚摇摇头，说：“别人不了解你的老婆，你还不了解她吗？这样吧，我把这个人找来问问。”

会议休息时，黄克诚找到谭震林，请他通知二师政治部把那个女干部叫来。

那个女同志来了，黄克诚说：“你谈谈你是怎么加入特务组织的。”

“那是一个漆黑的晚上，我去参加我们一个同学的聚会……”

她讲得有声有色。她说的越是形象，黄克诚越是怀疑，等她说完，黄克诚问：“你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

“真话！我从不对组织说假话。”

“这就好，我问你，你说的这些话，是不是有人要你这么说的？”

“不是……”

黄克诚已经看出她说话的态度和前几句都不一样了。于是又耐心细致地给她做工作，告诉她，要是说了假话对组织、对同志、对自己都没有好处，就是有压力也不能说假话。

听着听着，这个女同志忽然大哭起来：“我的那些话都是假话……”

“你为什么讲那些假话？”

“刚刚搞抢救时，我讲的是真话，可人们不相信。开一次会，又开一次会，我被他们整得没有办法，只好瞎说一气。我

瞎说了他们就不整我了。我越是瞎编，越是受表扬……”

黄克诚找到谭震林，对他说：“谭老板，这种抢救办法真是害死人啊！连曾希圣的老婆也给抢救了。”

谭震林也觉得很是吃惊，说：“真是这样子吗？”

黄克诚又问：“你们那里一共‘抢救’出了多少特务？”

“一个团大概有百十人的样子。”

“哎呀，这怎么得了哇！一个团要有那么多的特务，你们离敌人那么近，你们又把他们反复审查，那部队还不乱了套，人还不跑了？”

谭震林说：“一个也没有跑。”

黄克诚有些激动了，说：“老兄，我们那么整人家，人家一个也没有跑，哪有这样的特务！赶快给人家平反吧！”

谭震林说：“是这个道理。”

关于陈少敏

笔记之十七 绰号由来

第一次见到陈少敏的照片，是她和李先念、郑位三等人在一起。在场的一位老人指着她说：“知道吗，这是陈少敏，外号陈大脚，是中原的一员虎将！”

“陈大脚？”笔者觉得这绰号有点怪，对一位女性来说，似有不敬。

“对，在豫南、鄂中，人们从不叫她的大名。一说‘陈大脚’，没有不知道的。”

后来笔者到中原采访，听到的传说更是耸人听闻——红

军中有一女将，脚有一尺长，走路一阵风；骑一匹千里马，手使双枪，左右开弓。日本鬼子听说“陈大脚”来了，闻风丧胆……

敌人怕她，革命队伍中也有人“怕”她，谁在她手下做了错事，不被骂个狗血淋头才是怪事。因而有“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陈大脚来谈话”的说法。

“文化大革命”期间，对老干部、老同志实行紧急疏散。患有心脏病、关节炎及肾脏疾病的陈少敏被强行疏散到河南罗山，这里是当年豫鄂边区的根据地。“陈大脚回来了！”的消息不胫而走。老游击队员，农会、妇女会的干部从四面八方拥来，看望这位被“监护”的英雄。奇事出了一桩又一桩：

——一个老妇救会长，拎着一篮子小米、红枣和花生，当着“监护”陈少敏的人的面，对她说：“大姐，他们不要你，我们要你，我们像当年一样养活你！”

——一位老奶奶说，“我来不为别的，就要摸摸她那双大脚，当年她没为我们少跑路！”回家和女儿一起给陈少敏赶做了一双棉鞋。

……

至于这个绰号的由来，笔者反复考证，也无结果。一说因为她小时不肯裹足，生就一双大脚，在小脚林立的年代，被另眼相看；另一说则是，她的脚并不大，充其量 37~38 码，只是她走路风风火火，办事泼泼辣辣……

绰号归绰号，陈少敏确是“凤毛麟角”式的人物——共产党内长期负责一个地区全面工作的女领导干部之一。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仅有三位女委员，她是其中之一。（另外两

位是邓颖超和蔡畅）因此有人说，她和邓颖超齐名，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她的知名度远没有邓颖超高。

笔记之十八 非常爱情

有人说陈少敏一生未嫁，是个花木兰式的人物，其实不然。

陈少敏 1902 年出生在山东省寿光县范于村。原名孙肇修，参加革命后改名陈少敏。

在村里，她的父亲就是个有“反骨”的汉子，是全村第一个剪辫子的人。他具有反抗意识的个性，影响了陈少敏，使她成为全村第一个反对缠脚裹足的大脚闺女。这在前清的遗老遗少眼里，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她的父母却容忍和支持了她。

后来，陈少敏又外出求学，寻找为穷人翻身解放而奋斗的“穷党”。在文美女中，她参加了马列主义演讲小组，第一批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举行罢课，抗议校方的反动行为，又被学校开除。

离校后陈少敏回到寿光县，担任共青团县委妇女部长。1928 年，她在党旗下宣誓，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不久，她就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中去了。

正是在革命的洪流中，她找到了自己的真爱——任国桢。

任国桢是我党早期的革命领袖之一，1925 年中共奉天市第一个支部的书记，当过哈尔滨的县委书记、满洲省委委员、临时常委、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河北省委驻山西特派员等职

务。在山东时，陈少敏同他组织过一个假的家庭。组织上要他们扮为夫妻在青岛展开秘密工作。上级领导同陈少敏谈这个问题时，陈少敏一脸羞涩，说：“那怎么行呢？”

他们在共同的战斗中，假夫妻有了真感情，组织批准他们结了婚，并且生了一个女儿。后来，任国桢牺牲在山西，陈少敏非常悲痛。从此，再也没有对任何异性产生爱慕的情感。

直到晚年，陈少敏还把爱人的照片挂在卧室内。同别人说起爱人来，她很动感情：“他呀，任国桢，任国桢！鲁迅的爱雏！他写的《苏俄文艺论战》一书，就是鲁迅先生给写的序！”

只可惜，他们的这段真挚感情，没有能被后人记录下来。

笔记之十九 陈大脚的脾气

关于陈少敏的脾气，好几个老同志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她那个脾气呀！”那口气，是褒是贬，一言难尽。于是笔者请他们说说她的脾气——

建国后，陈少敏在全国总工会工作，她说：“工会是干什么的，就是为工人说话的！”

解放初期，一些纱厂还有童工，工资低，待遇差，陈少敏找过好几个部门，问题拖了好久，不能解决。她气愤至极，索性给毛泽东和刘少奇写信，信中说：“有三千余十来岁的童工，每天站在车边上，扯9个钟头的热茧，所得工资是一升二合小米，除饭钱外，仅余300元（人民币3元）连买鞋袜都不够！资本家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孩子怎么不去做童工？！”

对政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她更是毫不留情。她对

政府迟迟不能公布劳动保险条例更是不能容忍。她给政府提意见说：“工人积极性大大提高，不断地捐献、义务劳动、劳军、救灾，政府也应该照顾工人的生活，使工人从切身生活中感到政府是自己的。但我们的政府则爱把粉擦在屁股上，费了一年工夫，起草一个劳动保险条例，人民眼巴巴等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但至今不见公布。”

有一次她到青岛的一个纺织厂，见到旧厂长和工人的生活悬殊。当地没有人敢说话，陈少敏找到这个厂长，开口就说：“你看着，女工在厂门口干什么？”厂长一看，女工正给孩子喂奶。陈少敏说：“你住这么漂亮的小洋楼，让女工风吹雨打着给孩子喂奶，你心里落忍吗？你要主动地为工人办点实事。”在陈少敏的批评和提醒下，这个厂长搬出了小洋楼，办起了托儿所。

1958年，纺织工业战线上也放起了“卫星”，陈少敏到郑州的一个纺织厂视察，厂里的有关人员兴高采烈地向她介绍创高产的情况，想得到她的表扬，她听完汇报，说：“到车间看看。”

细纱车间，机器隆隆转动，花毛纷飞，断头率很高，工人大汗直流，纺出来的纱还是不合格，陈少敏指着引她进来的干部，很是气愤地说：“你们不要想蒙我，一听你们的数字，我就知道有假。你们这样搞大跃进，这是胡闹！”

“农民种棉花，工人纺纱有多么辛苦？你们就是这样领导生产的？生产出这么低捻度的纱，织出的布一穿就破，你们对得起谁？”

厂领导被她骂得抬不起头，一句话也不敢说。

她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去年一年中，我们卖了很多狗皮膏药（指浮夸风），狗皮膏药被我们卖完了。如再不解决此问题，只好卖西北风（这个不要成本）……”

好在毛泽东还很有雅量，对她的这些过激的话，毛泽东也没有怪罪她。

笔记之二十 何谓壮举？

何谓壮举？词典上解释为：伟大的举动，壮烈的行为。

一位曾经是中央委员的老人向笔者叙述陈少敏“文化大革命”中的行为时，用了“真 C. P”和“壮举”这样的词汇。

行为之一：

八届十一中全会时，毛泽东发表惊天动地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目标直指刘少奇。他甚至在大会上不指名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声色俱厉。会场气氛，空前紧张。

刘少奇在会上的处境可想而知，人们对他避之不及。此时陈少敏出现了，她跟着刘少奇走进了休息室。少奇坐下，她也坐下。

——他们是老上下级，刘少奇到中原时，她正在那里。

“少奇同志，孩子们好吗？”她想谈一些工作和生活上的事情，安慰少奇。

刘少奇很理解这种心情，对陈少敏说：“错误与同志们无关，我一个人负责，请放心。”

散会后，全国总工会的一些同志到陈少敏家中，想请她谈谈十一中全会的“内部情况”。她说，少奇挨批是真的，我

想不通，有意见。说着说着，眼泪顺着久经风霜的脸直往下流。她甚至说：“只要林彪一个，别的都不要了……”

后来，她流泪的消息传了出去，“她是刘少奇黑线上的重要人物”这一帽子，又有了新的材料。

不管怎么批判和围攻，陈少敏拒不写揭发刘少奇的任何材料，对来要材料的造反派说：“刘少奇是刘少奇，怎么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

行为之二：

所谓“二月逆流”发生后，中央开会，批斗谭震林、陈毅等老同志。此时的陈少敏沉默了。她一言不发。

那位整天阴沉着脸的康生，见陈少敏缄口不言，就点她的名：“陈少敏同志，你谈一谈嘛。”

“我身体不舒服。”

陈少敏说完，用拐杖敲敲地毯。

“不舒服也要表示态度嘛！”

陈少敏装做没听见。

康生恼羞成怒，说：“身体不舒服，你可以请假出去！”

陈少敏不屑一顾，依旧端坐，那样子，好像在说：你想叫我出去，我偏不出去！

康生拿她也没有办法。

行为之三：

按照“文革”期间的说法，扩大的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是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大好形势下召开的。除台湾省外，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相继夺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

道路当权派”的权，建立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在这个大好形势下，召开全会，解决中央的问题不正是大好时机吗？

可是，原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被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等罪名的占总数的71%。中央委员不够半数，无法开全会。但是，事在人为，从候补中央委员中补了10人，就过了半数。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等，都“扩大”，进来，总数达到133人，“人多议论多，热气高”，会议还能开不好吗！陈少敏是党的八届中央委员，是会议的当然代表。然而开会的前一天，她还没接到任何通知。甚至是一点消息都不知道。

她怎么能知道呢！从1967年开始，她就成了受冲击的对象。扣在她头上的帽子很多，什么“刘少奇在全国总工会的代理人”，“中原突围时的叛徒头子”等等。在全总机关挨批斗，还拉到中山公园音乐堂去坐“喷气式”……

这样一个“黑帮分子”，还能让她参加党的中央全会吗？——这是当时造反派的逻辑。

周恩来总理想到了她。当他发现报到名单上没有陈少敏的名字后，就派中央办公厅的人到中华全国总工会去问明情况。

挂着军用车牌号的北京吉普来到复兴门外的全总大楼时，得到的答复是：陈少敏是叛徒，不能让她参加中央的会议。

中央办公厅的人说，会议马上就要开了，周总理要我们来问情况、送通知的。

接待的人没有办法，只好把扣压的通知交给了陈少敏。

造反派还是不同意她去开会。但胳膊扭不过大腿，在中央办公厅的催促下，他们还是放行了。

陈少敏后来回忆说：当我拄着拐杖走进人民大会堂时，全会就要开始了。周总理叫我的名字，我答了一声：“到！”

会上印发了江青操纵的“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整理的三本所谓刘少奇的“罪行材料”，看了江青、林彪等人的批语，陈少敏简直怒不可遏。

江青批示，称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是“美国远东情报局代表”。林彪批“完全同意”。并且肉麻地写道：“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这哪里是什么正常的党内斗争，完全是要把人置于死地！

10月23日的小组会讨论《审查报告》，陈少敏做了一个“检查”，与其说是检查不如说是给刘少奇开脱所谓罪行，这必然招来严厉的批判。

有人说她“根本没有同刘少奇划清界线”。有人说她“思想上不通，和中央的精神有抵触”。……

随你们怎样说，陈少敏还是不明确表态。

24日，继续开会。陈少敏成了江青、康生一伙的重点攻击目标。

“陈少敏，对中央专案组的审查报告，你到底是什么态度？”

“这是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

“刘少奇的罪行，你应该清楚，你和他在一起工作过那么

长时间！”

陈少敏抬抬眼皮，回答一句：“少奇同志有错误可以检讨嘛！”

她居然称叛徒、内奸、工贼是同志！这不能不把戴眼镜的康生激怒。康生站起来，恶狠狠地说：“这就是你的态度？！你要考虑后果！”

后果，陈少敏早就考虑到了。没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她是不敢这样说的。

“你这个人，连乡下老太婆的觉悟都没有哩！农村老太婆的觉悟都比你高！”

这是同一小组的一位人士对她的评价。这句评价印在了当时的简报上。

行为之四：

应该说，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时，是这届全会的“高潮”。那时，很少使用投票的办法进行表决，也没有当今的电子计算机显示计票。通常采用的是鼓掌通过或举手表决。当代表们举起森林般的胳膊时，不是显示出统一的意志和一致的力量吗！

播音员宣读完《审查报告》，便是举手表决了。

“同意的请举手！”

齐刷刷的手臂先后举了起来。有人举过头顶，有人借助桌面举起，也有人不那么情愿地抬起臂膀……

此时此刻，趴在桌上，用庄严的右手捂住左胸的陈少敏，用这种特定的方式，表示自己鲜明的态度。

“好，一致通过。”

不知是工作人员的疏忽，还是出于对这位大姐的爱护，反正没有人在会场上把这一情况讲出来。

陈少敏没有举手。

——这实在是惊人之举。当时的环境、当时的气氛，是不容许人们有不同意见的。谁表示不同意见，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谁就要被“打翻在地”。

事后陈少敏说过，她已经做好了最后的准备：一生都交给了共产主义事业，来去无牵挂，再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快七十的人了，难道在党内斗争中，他们还会把自己怎么样？

她不举手的行为，还是被那位戴眼镜的“康老”知道了，阴沉着脸找到陈少敏。

“你为什么不举手？”

同康生打交道，已经是多少年的事情了。全会期间，他们也曾有交锋。陈少敏对身居高位的他并不惧怕。她回答说：

“这是我的权利。”

声音虽然不高，却足以令人震撼了。

陈少敏的态度，令不少关心她的人担心。在她身边工作的同志尤甚。司机项怀玺至今记得清楚，散会那天，他去接陈大姐，见她脸色很难看，就问：“大姐，你不舒服？”

“不是。今天开会开除刘少奇的党籍，我不同意。”

批判刘少奇，项怀玺是知道的，但他没想到刘少奇戴那么大的三顶帽子。

“我没举手。”

项怀玺害怕，这是中央的全会，不能有不同意见啊！

“你不举手，他们……”

陈少敏还是那句话：“这是我，一个老共产党人的权利。”

第二天全国的宣传机器宣传“一致通过”的时候，这位老战士，用手中的拐杖敲着地，对来探望她的老同志说：“一致个屁，我就没举手！”

所以，后来说起刘少奇冤案时，胡耀邦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大家都犯过错误，都举了手。就是陈大姐没有举手，没有犯错误……

笔记之二十一 遗憾

林彪摔死后她回到北京。情况稍有好转，但心头的阴云依然不散。她看到“四人帮”等人的形象在电视上出现，就用手敲床头柜。她只能用这样的办法来发泄心头的义愤了。

1976年元月，周恩来总理去世。在举国悲伤的日子里，这位老共产党人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再去看周总理一眼。然而，这点愿望也根本无法实现。她气得把床头柜拍得咚咚直响。恰巧有一位老同志来看她，她怒火冲天地说：“向总理遗体告别，还要资格，凭什么资格？我凭共产党员的资格！”

她还说：“总理是被他们气死的。早晚要跟他们算这笔账！”

周总理尸骨未寒，“四人帮”磨刀霍霍。上海出现了要张春桥当总理的大标语。消息传到陈少敏耳朵里，她气不打一处来，高声说：“我不赞成，不投票！”“他要当了总理，我们国家就完了！”

一些老同志问她：“如果选总理，大姐准备投谁的票。”

她提高了嗓门，说：“我选毛主席说的那个人才难得的人

的票。”

大家都会意地笑了。

陈少敏又说：“党和国家的大权，一定要掌握在真正的共产党人手里，我们的国家才有希望！”

陈少敏有幸看到了“四人帮”的覆灭。那时她兴奋得像个孩子，挥动着能动的右手，叫道：“拿茅台来！干杯！”

她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她还想和人民群众一道干共产主义事业。然而她被迫害的躯体已经再也不能站起来了。1977年12月14日，她永远地走了。

她惟一的遗憾，是没能看到中共中央给刘少奇摘掉那三顶“帽子”。

关于谭政

笔记之二十二 大将夫子

在共和国1955年授衔的十个大将中，谭政被人称为“夫子”。

人们称他为夫子，倒不是因为他说话总是之乎者也，也不是因为他身上有老知识分子的酸气。更不是因为他很注重仪表，讲究整洁……而是说他为人做事很有学者风度，很有知识分子的刚直和谦逊。

然而，政治家对儒将身上的书生气是很有警惕的，不是有那么一句名言吗：切不可书生气十足！

还有人告诫说：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当然也有人歌颂书生气，赞美这种书生气，多年来，有人不是以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自豪吗？

谭政大将虽然身经百战，但他身上的“书生气”总也改不掉。直到他像许多老人一样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以后，也没有改掉这一点。

在和他的老秘书乔希章同志的接触中，笔者知道了不少他充满“书生气”的行为——

笔记之二十三 给个棒槌就认真的“夫子”

1961年初，谭政等来的是一纸命令，他所担任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免；中央军委常委，免；国防部副部长，也免。

同时他接到一纸任命：总政治部的副主任。这对一个政治家来说，不能说不是一个大的波折。

由总政治部主任降为副主任后，他分工管总参、总后和总政直属单位的政治工作，后来又加了一项公安部队的政治工作以及民兵政治工作。

如果按照别人的想法，这种安排实际上是不让你再工作了，而谭政是那种给他个棒槌他就认真的人。他还真的行使起副主任的职责。

——他跑了总参的直属单位，一个又一个的招待所，一个又一个通信站，看那里的政治工作是不是保持了战争年代的光荣传统。

——他跑了总政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又跑八一体工大队。要人家谈怎样做好演员的思想工作，怎样正确对待比赛中的胜败……

——不是要他管公安部队的政治工作吗，他就下到了公安总队一些哨所，去和那里的战士促膝谈心……

——不是管后勤的政治工作吗，他就到武汉的一个被服厂去蹲点，一蹲就是三个月。

“大有收获，大有收获！”回到北京，见到了罗荣桓元帅，他很有几分兴奋。

他很详细地向罗帅讲起军事工厂的一些情况。说到了一些存在的问题，还把他带回来的几件不合格的衣服给罗帅看。

他说：“咱们有些军事工厂有问题，你看看这些衣服！那些生产军械弹药的工厂，那要是出了质量问题可是不得了！”

罗帅也很是高兴地对他说：“好哇，好哇，你把调查的情况写个报告，也准备一个稿子，向军委汇报。”

于是，谭政就认真地准备起来了。手头的材料是现成的，他不用准备就能说出许多事情来，但他还是认真地准备起来。自己动手写提纲，认真和秘书凑材料。

材料准备好了，也向上面报告了，说叫他等，他就静静地等。一天过去了，没有消息，两天过去了，还是没有消息。等了几个星期，还是没有消息，他不能再等下去了，就又去找罗帅。

这时罗帅身体已经是越来越不行了，他自己也无能为力了。

一天，他正在总后参加会议，得到消息说罗帅不行了，他和李聚奎上将飞车赶到罗帅家里，也没能说上一句话。这不能不使他悲痛万分。吊唁时不好有更多的表示，回到家里，他不禁失声痛哭……

1964年，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开始了。不少领导同志都下去了，谭政也决定下到基层去。

他下去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改造自己的思想。

他选择了江西九江的一个军工厂。他的正式职务是工作组的组长。到厂的第二天，他就穿上工作服下车间劳动起来了。为了和工人打成一片，他改了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名字——唐一夫。

这又应了他的那个外号——“夫子”。

他在这个工厂正经当了半年多的工人。工人们对这个“老唐”很感兴趣，有什么话愿意对他说，甚至有的工人家里发生了矛盾也愿意找他去帮助解决……

既然是工作组的组长，就还要管一些事情。一天他接到江西省委的通知，到南昌去参加一个会议。

他带上秘书就去了。研究军工生产，他现在是有发言权的。

谁知来到南昌的当天晚上，秘书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请告诉谭政同志，他是犯了错误的，他没有资格参加这个会议。”

秘书觉得不对头，就问：“这是谁的意见？”

电话里说出了一个很响亮的名字。

秘书只能回答：“知道了。”

怎么和谭政老头说呢？秘书可是费尽了心思。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扯谎。

“谭政同志，会议改期了，我们要先回九江。”

谭政说：“不会吧，不是定好了的吗？”

秘书说：“刚刚改的。”

“不行，我要去问问他们，哪能这样不负责任，劳民伤财。”

秘书再次劝他：“首长，就不要再问了吧！”

他说：“不问怎么行，是不能这个样子的呀。”

秘书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把真实情况告诉了他。他这才不说话了。

他沉默了一阵，又问：“是谁不让我参加会的呢？”

秘书只好告诉了他。他又吃惊地睁大了眼睛，连声说：“不会的，不会的。”

秘书只好说：首长，不要太书生气了……

笔记之二十四 徐帅一语中的

“文革”前，谭政被降职到了福建省当副省长。副省长的椅子还没有坐热，“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又起。他先是被福州军区卫生学校的造反派抓走，后来又被揪回北京接受三军造反派的批斗。

他曾经对人说过，文革中，他是把所有批斗手段都尝了一遍。后来又被关进了监狱。一关就是八年……

当他从自己的监狱里出来的时候，他说话用语迟顿，腿脚不灵，神经都有点不正常了。活脱脱一个小老头。老秘书去见他时，他老泪纵横，哭得像是个孩子。

“没有想到我们还能见面啊！”

老秘书问起在监狱里的情况，他摇摇头，说：“八年了，别提它了！”

说这话颇有点像当时样板戏里的台词。

他说起出来以后的情况，说到不少老同志来看他，“那天耀邦同志来了，特别关照他们照顾我的生活”。说着说着，止不住又流泪了。

“我是出来了，但就这么呆着，也不是个办法，总得有点事情做才行啊！”

这就是谭政，这就是他的书生气。

老同志给他出主意，“那你就给叶副主席写封信，把你的情况说一说”。

他觉得可行。第二天就动手给叶帅写了一封不是很长的信。

此时，邓小平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叶帅很快把这封信批给了他。

向来以作风干练而闻名的邓小平很快就把这封信转给了毛泽东，并做了批示：主席，谭政无大错，建议安排军委当顾问。

当天，这封信送到了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也想到了这个湖南老乡，他们应该说是老熟人了，井冈山时期，谭政就当过他这个前委书记的秘书。毛泽东在谭政的信上用粗粗的铅笔画了一个很大的圈。表示同意小平同志的意见。

这样，谭政大将又穿上了他无比喜爱的军装。

说来也是很有意思，他穿上新军装的时候，高兴得像个新兵。虽说没有了当年的大将军衔，但这“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也足以让这位老红军战士兴奋得睡不着觉了。

他穿了军装去看叶帅。在西山叶帅的住所，他握住老师

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叶帅看他的身体被摧残成这副模样，也好半天没有说出话来。

“谭政啊，”叶帅坐下来，关切地对他说，“你出来工作，是小平同志建议，毛主席批准的。你呀，能做多少工作，就做多少；身体不好了就不要像过去那样，不要勉强。”

叶帅说话的声音不大，谭政的耳朵已经有点背了，没有听清。叶帅只好又说了一遍。

谭政听清楚了，但他还是他，说：“能工作了，我就要给党多做点事情。”

俩人说了许多过去的事，但也有很多的话没有说出来，他们还不能说啊！

分手时，叶帅说，你的耳朵不好了，送一个助听器给你吧！

谭政接过来，试了试，说：“清楚多了，这东西好！”

……

他又去了徐向前元帅家里。站在徐帅面前，徐帅竟然不敢认他了。

“谭政，你怎么一下子老成这个样子了？”

谭政苦笑了一下，说：“林彪把人往死里整。”

两双久经风霜的老手握在了一起很久没有分开。

“你被关了几年啊？”

“快九年了。徐帅，你说，他们怎么能这么整我呢？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整我。”

“你个谭政，真是个书生。要整你，还要问为什么？”

徐帅的山西腔，久久响在他的耳边。

笔记之二十五 临终前还“较真儿”

到了晚年，他还为那个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做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较真儿”。

当年批判谭政的时候，有个很是时髦的说法，叫做新账老账一起算。有人和他算老账：

“1944年，你谭政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做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是经过毛主席几次修改形成的。这是毛主席的著作，可用你的名义发表以后，你捞了多少政治资本？”

谭政忍无可忍了，他站起来说：“这个报告是我起草的，也是毛主席修改的，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的，后来在大会上宣读和在报上发表用我的名义，都是中央开会定下来的，我就是想用我的名义发表也发表不了哇！”

“这才是你的真实想法，你就是想借此捞政治资本！你还不承认！”

批他的时候，他不认这个账，后来他更不认这个账。

他说，那个稿子我改了六次，毛主席只改了一次。而且是经过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的。怎么能说这个稿子不是我写的呢？

有一天，一个地位相当高的人来看他，对他说：“谭主任，你在延安作的那个政治工作报告，不能算是你的著作吧？”

他没有回答。对这样的问题他是不屑于正面的回答的。

过了不久，有关方面给他送来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文件中，有一个附件，就是那个报告。这回的处理更是有趣，没有署谭政的名，也没有署别人的名，而是署了“留守兵团政

治部”。

谭政又好气又好笑，很不高兴地对秘书说：“留守兵团政治部怎么作报告？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秘书能说什么，只能说：“可能是他们搞错了吧？”

他还是十分认真地说：“历史总会是真实的，总有一天会有人说公道话的。”

没有多久，他就得了脑血栓。有人说，那是气的。谭政自己什么也不说。这会儿就是想说，他也说不利索了。

有一天，老秘书兴冲冲地来看他，坐在病床边赶快拿出一本书。对他说：“谭老，这是党的权威部门编辑的《党史参考资料》里面收了你的那篇文章。”

他没有听明白。他的耳朵是越来越不行了。

秘书又赶忙给他写在纸上，告诉他这个消息。又把书打开给他看，他明白了，脸上出现了难得见到的笑容。

他的嘴动了动，说出了几个字。老秘书也无法听清楚他说的是什麼，从口型看，好像是说：

“实事求是就好。”

有人说，谭政这个人就是特别计较这些事。

谭政说：这不是个名利问题，对这样的事有必要较较真！